

第四节 山涛靖南建奇功 昆仲屯守拓桂海

韦山涛，字应德，号大猷。宋皇祐四年（1052年），山涛携六子率山东铁骑军随狄青平定岭南“大南国”，并留下他们戍边骆越地，为开发和发展广西又增加了韦氏家族中一大支系。

北宋初，韦山涛不忘祖先报效国家意愿，几经历练磨难，重在山东崛起，教习6个儿子景岱、景明、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励志习武，学就一身本领，个个骁勇，准备为国效力。

宋皇祐元年（1049年），广西“西原蛮”广源州首领侬智高不服交趾侵扰，强占边境，因而屡求纳土归附，被宋朝廷拒绝，于是忿而起义，实行“兵谏”，“以战求附”。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外遭交趾侵犯，内受北宋压制，处于难以生存的艰难困苦形势之下，不得不离开反抗交趾的前哨——“南天国”，举起反宋起义的旗帜，摆脱交趾的奴役，冲破宋朝的压制，沿右江东下，直取邕州（今南宁市），捣毁北宋王朝在南疆实施统治的老巢，建立“大南国”。进而挥师沿郁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克横、贵、袭、浔、藤、梧、封、康、瑞九州府，声势浩大，直逼广州城下，朝廷震惊！北宋王朝惊恐之中加强对五府经略置地广州的防守，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增援广州。侬智高围攻广州57天不下，于当年7月撤围，经清远北上韶州，攻贺州，破昭州，克柳州，占宾州，回师邕州，用重兵把守昆仑关，以图经营治理“大南国”，待机纳土归附宋朝廷，实现“以战求附”的心愿。但北宋王朝把侬智高视为心腹之患，于是宋仁宗下诏枢密副使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率领从西北调来的蕃落骑兵数万，挂帅出征。因为先祖曾在广西平叛而建功立业的缘故，韦山涛认为此乃天赐良机，不容错过，于是迫切地向狄青自荐，请求随军南征。狄青念其名门之后，委以参军之职。不日出征，山涛携景岱等6个儿子，率领以族人宗亲为主的1700人组成的铁骑军，为南征先锋，从山东白马县出发，浩浩荡荡直抵广西。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期间，山涛铁骑军配合西北蕃落骑兵，“含枚夜度昆仑关”，鏖战于宾州（宾阳县）昆仑（雄南）关西南的归仁铺（当时属宣化县，今为南宁市郊三塘）。侬智高则因起兵之后节节胜利，加上欢度新年，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结果兵败于昆仑关侧归仁铺，邕州失陷，侬智高大败。史称狄青“元夜三鼓夺昆仑”，说的就是这一战。

侬智高兵败归仁铺之后，自知大势已去，兵微将寡，士气已尽，无奈地背负老母，与弟智光、子继封继明等，沿右江河谷逃往合江口（今云南文山县西北盘江与众水合流处）。狄青部将杨文广、于振率部追杀，韦山涛6个儿子随营，追得侬智高疲于奔命，转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县），西去大理国（今云南大理）。杨、于两将不再追击，返回

缴令。

平定侬智高之后，韦山涛随狄青于皇祐五年（1053年）二月班师回京。宋仁宗设御宴庆贺，擢用狄青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口谕赐封韦山涛为千岁。

“大南国”的建立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作为壮族领袖的侬智高领导的反对宋朝廷的起义，无疑是一场反对内外统治集团的压迫剥削的完全正义的战争，并得到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至今还流传在桂、滇、黔等地的许许多多歌颂侬智高反宋朝廷的诗歌、民间故事等，就是明证。在这里，我们研究的主题尽管只是探讨韦氏人桂的相关史料，并没有涉及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问题，但由于历代以来存在的民族融合事实，我们之中相当一部分韦氏已是壮人中的一份子，对侬智高同样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给予他正确的历史评价也是人之常情。

侬智高是北宋时期广南西路邕管羁縻广源州（今广西靖西、大新两县交界的中越边境）首领。《宋史·广源州》记载：“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质，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1]。侬智高于公元1025年出生在祖国南疆边陲广源州史称“侬峒”的壮族小首领家庭。侬峒，也称农峒，原为唐代所置羁縻州峒政权之一，隶邕州都督府下属的西原羁縻州。侬峒开始据有雷、火、频、婆四峒地（均在今广西大新县境内），因其酋长为侬氏，故称侬峒。后来侬氏势力发展，由四峒变为四州，“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氏”^[2]。安平州在今大新县境，武勒州在今扶绥县境，忠浪州又叫思浪州，在今大新县境，七源州在今广西凭祥市附近。到侬智高起兵反宋前，侬氏家族已发展到特磨州（今云南省广南、文山一带及广西右江上游地区），势力比较强大，地盘也相当宽广。

侬智高就是在祖国边陲这样一个有一定势力的家族中成长的。他的父亲侬全福，为北宋邕管羁縻广源州首领。宋沿唐制，羁縻广源州是北宋王朝设置的边境地方行政单位之一。广源州地处边陲，与交趾（是时已摆脱中国成为自主封建国家）接壤。虽然人烟稀少，但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同时，广源州盛产稻米、黄金和丹砂，早为交趾统治者所垂涎。为此，交趾统治者经常发兵侵犯广源州，强迫侬全福每年进贡土特产、金银财宝，还课派徭役，致使广源州民众负担沉重，生灵涂炭，日无宁宇。“广源州为邕管羁縻州，属左江道”^[3]，交趾统治者如此贪得无厌，苛索财物，实属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身为广源州首领的侬全福坚决不向交趾屈服称臣》因而于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在其领地建立“长其国”，自称“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公开与交趾对峙抗衡。新强盛起来的交趾统治者贪婪而猖狂，出兵侵扰、占领广源州。侬全福奋起抵抗，但寡不敌众，被掳掠到交趾京城作人质，结果造成“广源州虽号邕管羁縻州，其实役属于交趾”^[3]的反常局面。《涑水纪闻》卷十三记载：“广源地区有金

矿，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终为所灭，乃叛交趾。”^[4]侬全福被杀害于交趾京城，“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4]这些记载说明，交趾出兵侵占广源州，把侬全福俘获，要侬智高带金银财宝去赎回父亲。不料交趾得了金钱，非但没有放回父亲，反而加以杀害。侬全福于1039年（即他建立“长其国”的当年），被杀害于交趾京城。当时侬智高只有14岁，与他母亲偷偷逃脱才幸免于难。

侬智高的母亲史书称为阿侬，说她颇有谋略，胆识过人。后来侬智高反抗交趾统治者和北宋王朝的斗争，攻城夺县，建国称号，自立为王，他母亲参与筹谋策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侬全福被害之后，为逃避交趾的侵扰，年幼的侬智高在他母亲的关怀、帮助、指导下，收集了他父亲之余众，韬光养晦，缮甲治兵。四年后，即庆历五年（1045年），侬智高已经年满20岁，从少年长到了成年。成年后的侬智高思想坚定，爱憎分明，不忘杀父之仇。为了表白他不再臣事交趾的坚强决心，就在他的家乡儆犹州（今广西靖西县，当时辖安德等州，不属广源州管辖），厉兵秣马，养精蓄锐，揭竿而起，建立“大历国”，拉起了反抗交趾的大旗。但因势单力薄，旋即为交趾所败。侬智高被俘，解往交趾牧马（今越南高平）。交趾统治者鉴于杀了侬全福仍救治有征服广源地区的壮族人民，于是改变策略，采用笼络手法。他们首先把侬智高放回，并“以雷、火、频、婆四峒及思浪州附益之”^[4]。次年，又赐给侬智高郡王印，并拜为太保。

但是，交趾统治者的高官厚禄根本无法改变侬智高的爱国初衷，他的爱国情怀如故，抗拒交趾入侵的决心更坚。他一方面韬晦待时，暗中招兵买马，积聚力量；另一方面向人们控诉交趾出兵侵犯中国边境的罪恶行径，深得壮族人民的拥戴和崇敬，推他为首领。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组织筹划，年满23岁的侬智高在庆历八年（1048年）9月以安德州（今广西靖西县与那坡县交界的安德乡一带）为根据地，另建“南天国”，公开与交趾统治者相抗衡。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又被交趾所败。在建立“大南国”的同时，侬智高曾多次派人到邕州请求内附，均遭拒绝。在外受交趾侵犯，内遭北宋王朝拒绝内附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侬智高结识当时来贩黄金做生意的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并与二黄及部将侬健强、侬志忠等商议起兵反宋，以达到“以战求附”的目的。经过周密的运筹谋划，精心组织，年满27岁的侬智高亲自率领部众5000余人，于皇祐四年（1052年）4月离开“南天国”，沿右江东下，首先攻占右江上游重镇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继而沿右江顺流直下，扫荡沿岸守兵，飞速攻破邕州（今南宁市），立斩知州陈洪，都监张立等宋朝官兵1000余人。邕州是北宋王朝在南疆实施统治的最大地方行政单位之一，辖区包括左、右江道45州、5县、11峒^[5]。侬智高攻破邕州之后，地盘扩展，兵马增多，势力强大，是年5月在邕州改称“大南国”，以

中国官名封官建制，公开与北宋王朝分庭抗礼，同时与交趾对峙抗衡。这个地方政权颁布了大赦令，打开牢笼，释放囚犯；打开官库，接济贫民和士兵，广泛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当时左、右江一带及邕州地区的各族人民，都纷纷主动为这个政权资助粮食和各种物资，不少人还自愿参加侬智高的起义队伍^[6]。《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枢密院言：蛮贼徒党，无虑二万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资其粮者，则势不可留，须法外禁之。”^[7]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是支持与拥护侬智高的，因此他的起义队伍发展迅速，很快从 5000 余人扩充到 20000 之众。

侬智高在邕州立国建制之后，稍作休整，接着挥师沿郁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克横、贵、袭、浔、藤、梧、封、康、瑞等九州府。沿途的壮、汉各族民众纷纷加入侬智高队伍，部队迅速增到数万之多，兵强马壮，声势浩大，震惊朝廷。侬智高挥师东下，一路攻城克州夺县，北宋王朝惊恐之中加强对五府经略置地广州的防守，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增援广州。侬智高围攻广州 57 天不下，于当年 7 月撤围，经清远北上韶州，攻贺州，破昭州，克柳州，占宾州，回师邕州，用重兵把守昆仑关，以图经营治理“大南国”，待机纳土归附宋朝廷，实现“以战求附”的心愿。如前所述，北宋王朝把侬智高视为心腹之患，遣枢密院副使狄青，率兵数万打败侬智高。侬智高率领余部退走特糜道，收集余部，习骑备战，以图东山再起。至和元年（1055 年），侬智高母亲阿侬、长子侬继封、次子侬建明被宋军俘获，翌年被害于洛阳。公元 1055 年 4 月，侬智高去大理国借兵，亦被杀害^[8]。侬智高起兵反宋历时一年多终告失败。

虽然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却狠狠地教训了宋朝赵祯统治集团，促使其在平侬后，更改对广源等边疆地区的民族政策，并新设土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另一方面，宋朝廷对交趾国（今越南北部）新兴统治者的庸懦苟安的方针，依然故我，以至令交趾国侵略中国的野心愈来愈大，终于在 19 年后的 1071 年，酿成了交趾国大举进犯广西，并屠城邕州，残暴地杀害成千上万邕城百姓之罕见的历史惨案。到了元丰二年（1079 年），宋神宗赵顼竟以“荒远”、“瘴疠”为由，把好端端的广源州（此前不久宋朝曾将其更名“顺州”）双手奉送给交趾，大宋江山从此少了一隅，侬智高死不瞑目^[9]。

奉朝廷之命平定侬智高之后，韦景岱又奉命追剿侬智高弟侬日造残部而进入木兰峒（今广西东兰县），其五个弟弟也随之而来广西戍边，安家立业。景岱奉命领兵入都彝哨招抚守边，初授木兰峒冠带，后授木兰安抚司^[10]，世袭，辖平林、都铭、三旺及东院、长江、武篆、凤山等内外 12 哨。景明与兄奉命追剿侬日造累建战功后，移庆远府（今宜州市）南三镇，任庆远府永宁县长官司^[11]，世袭永定土司。裔孙有 32 个支系，除住宜州各乡镇外，还分布上林、桂平、象州、浦北等地。景宗受派思恩府那马镇（今

马山县)，后任思恩府那马巡检^[12]官，迁入宾州北街。景福协同长兄景岱入都彝，驻木兰长塘，负责各地征剿，后安家宾州北街。景文封修职郎^[13]，留驻贵州（今广西贵港市）两江，后驻守宾州昆仑关及西江流域，落籍宾州潘山村。景武屯防罗定司兴隆（今田林县地）。至此，韦山涛6子及族人宗亲全部落籍广西，子孙繁衍成为八桂大地韦姓最多的一支。因为韦山涛被宋仁宗口谕封为千岁的缘故，所以民间呼其子景岱为千一公、景明为千二公、景宗为千三公、景福为千四公、景文为千五公、景武为千六公。这就是“千一公”、“千二公”等称呼的由来，此“公”并非皇封勋爵之“公”，皆为民间对前辈老人尊称而已。

广西宾阳是韦姓最多的县份之一，族人多为山涛之后裔。据1998年统计，景岱、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在宾阳的后裔，已有11.58万人，分居全县23个乡镇349个自然村（圩）。也许是因为宾阳的韦姓人口众多，且来源是韦山涛之子嫡亲后裔，所以韦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不仅有历代县志记载，还有《韦氏族谱》、《韦氏资料集》等书籍存世，有绵延数百年依然香火不断的韦氏总堂。韦氏总堂始建于明朝年间（约公元1630年），即山涛之孙俊卿的后裔在宾州城外北楼创建的韦氏宗祠，至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1988年始，各市县韦氏兄弟多次捐资进行维修、续建，砌殿坛，写牌位，立始祖元哲，支祖料贞、韦厥和山涛6子、17孙等为主位。恢复春祭（二月初十）、秋祭（八月初十）。春祭为小祭，秋祭为大祭。每个祭期，特别是秋祭，参祭者多达二十多个市县。进入二十一世纪，春祭为宾阳县各乡镇轮流主办，秋祭主办则由各市县轮流负责。自此以后，古已有之的宾阳韦氏宗祠才成为真正意义的韦氏总堂。

本来行文至此，这一节是可以画上句号了的。然而，由于过去一些研究者不能确定广西民间所说的“山东白马”原在何处，草率地提出质疑，以致对于广西有关姓氏几百万人民的“根”持否定态度。为此，有必要予以释疑。

在桂北、桂西北至桂南、桂西南广大壮、汉地区，不但韦氏称其祖先随狄青来自山东白马的说法，而其他姓氏如覃、莫等也有这样的说法，并见诸不少旧志和明、清史籍。俗话说：“谎言腿短”。如果有关姓氏的“祖先随狄青来自山东白马”的说法是“谎言”的话，它能在民间和史籍中流传数百年之久、以致现在的相关民众还深信不疑吗？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史学研究专家唐志敬编审等人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广西民间有关汉族姓氏“随狄青来自山东白马”的说法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谎言”。

“白马”这个地名，最早见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这里说的是陈胜进入河南之后，命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余为校尉，由魏征赵，大军从白马渡河。《史记索隐》^[14]按：“酈食其云‘白马之津’，白马是津渡，其地与黎阳对岸。”民国《辞源》对“白马”和“黎阳”两个词条的释义表明，原来的黎阳津即是白马津，在河南滑县北，而汉朝始置白马县的故城也在滑县东北。当时的地图亦标

明，滑县正在豫北，在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通往赵国（都城邯郸）的要道上，居太行山之东，黄河故道之滨。可以说“山东白马”、“从白马渡河”二说完全吻合，都在今河南滑县境内。据悉，到了宋朝，白马则是当时禁军的驻地，也是狄青率领南下广西那支禁军的出发地。而滑县是韦氏的发源之地，有其弟子跟随狄青南征亦在情理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南宁市郊友爱村编修村志，该村六大姓群众对“寻根”有强烈要求，在村委会的极力支持下，主编覃芝馨两次前往河南（一次还有村领导和六姓代表参加），得到了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教授的帮助和指导，终于揭开了广西几百万讲平话的汉族人民和部分壮族人民的“根”之谜，不但满足了寻根者们长期梦寐以求的愿望，增进了民族凝聚力，而且对研究汉族进入广西及壮、汉民族的融合与同化，以及广西南部地区的开发，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15]

我们应从社会记忆理论和族群认同理论的视角探讨韦氏南迁的丰富原始素材，从而进一步给那些对韦氏入桂持否定态度之“方家”消除疑虑。

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王明珂^[16]结合社会记忆理论和族群认同理论，在探索“华夏”及“羌族”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历史记忆”研究，主张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发掘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当代史实”。^[17]他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当代情境。^[18]

如前所述，广西韦姓多为山涛之后裔，确实符合“历史记忆”理论。据1998年统计，景岱、景宗、景福、景文、景武在广西宾阳的后裔，已有11.58万人，分居全县23个乡镇349个自然村（圩）。也许是因为宾阳的韦姓人口众多，且来源是韦山涛之子嫡亲后裔，所以韦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不仅有历代县志记载，还有《韦氏族谱》、《韦氏资料集》等书籍存世，有绵延数百年依然香火不断的韦氏总堂。

把广西韦氏视为用“历史记忆”理论来分析，不难发现，在其背后实际上“全息”记载了广西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一方面，根据王明珂的看法，“历史记忆”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广西韦氏特别是韦山涛后裔，包含着韦氏迁徙的“根基历史”，构成了广西韦氏的“祖源记忆”，这是广西韦氏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王明珂认为，把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的许多“过去”，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主要是留下这记忆的“当代情境”。

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anom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了解一时代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从表面上看，广西韦山涛后裔讲述的是“过去”的韦氏迁徙故事，那些故事并非就是真实的“历史活化石”，这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视其为韦氏迁徙时代的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并以此来重新建构我们对韦氏“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韦山涛后裔所陈述的人物与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史料文本的解读，来了解其背后所隐藏的当代情境。

早在80多年前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19]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已经树立了一个范例。他的精辟分析让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孟姜女”故事，后来的孟姜女哭长城、秦始皇暴政等等情节是后来者一步步地叠加在最原始的信息上面。一个事情就是通过流传——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文献上——一层层地加上了很多后人的一些和当时的情境结合起来的人为的东西。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真实”，就要一层层地剥离历代黏附粘连在上面的东西。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指出，传说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一层层叠加、黏附的过程本身也非常值得重视，他的这种方法已经为我们的提供了一个范例。^[20]这一理论使他在“正史”之外，把歌谣、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家乘和族谱等均视为史料的积淀而加以利用，从而扩大了史料的范围。^[21]依据古史辨派的“层垒”假说，我们可以把广西韦山涛后裔视为韦氏文化史料的积淀，在口头传承年代，不断有后人结合当代情境，一层层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样，通过研究广西韦氏迁徙的年代，我们就清楚叠加在最上面的那层信息所反映的“当代情境”。要不然，我们如何去理解广西韦氏厚重的历史文化？！

[1]《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

[2]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3]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十三。

[4]转引自《岭南壮族汇考》第437-464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5]《宋史·地理志》，《续通典·州郡八》。

[6]黄现瑶等编著：《壮族通史》第75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7]《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

[8]《宋史记事本末》。

[9]黄振南：《壮族英雄侬智高》，《南国早报》，2009年7月11日。

[10]安抚司，官署名。元始置于四川、湖广少数民族地区，每司有达鲁花赤一人（个别不置）、安抚使一人，下设同知、副使、佾事、经历、知事等官，此外又有加置照磨、镇抚者。明、清沿置安抚使司，设安抚使等官。入民国后，安抚使等官仍有存者。

[11]长官司，地方政权机构名。元朝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置，又称“蛮夷长官司”。秩如下州，设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等，多以土人为之。明、清沿元旧称，只作为土官世袭的地方政权。湖广、四川、云南、广

西、贵州等省设有。设升官、副长官等职。

[12] 巡检，官名。宋于关隘要地及荒远地区置巡检官，各地接连之处置都巡检加以总管，皆以武臣担任，属州县管辖。也指掌训练甲兵，巡逻地方，维持治官，镇压反叛。海南及归、峡、荆门等地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辽北面边防官有巡检、同巡检，南面边防官有巡检使。金于中都及各州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散巡检等。元、明、清皆沿置巡检官。

[13] 修职郎，文阶官名。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改登仕郎置，为文官第三十六阶。金、元无此官名。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从八品初授边功佐郎，从八品授修职佐郎。修职郎、修职佐郎是正八品和从八品文官的散阶，散阶是授予官职时同时授予的虚衔，像今天军衔。

[14] 《史记索隐》由唐代司马贞撰写，共三十卷。运用大量的文献作校勘材料，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使一些书目得以流传下来，便于后人辑佚，有功于目录学。另外，《索隐》在文献考证上也取得丰硕成果，考证《史记》中的人名、史实、司马迁生平等等。现存于各大学术机构的版本为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15] 覃芝馨的考证调查见覃芝馨主编：《友爱村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6]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台湾师范大学毕业，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人类学组主任及副所长，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校。1994至2003年间，在四川西部群山之间从事累计约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2至2007年多次到内蒙古及四川西北进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考察。

[17] 王明珂（台湾）.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

[18] 王明珂（台湾）.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 历史研究，2001，(5)。

[9]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在工作期间，草拟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提出了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进而提出“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的见解，并建议编“待访书目”，这些建议对改进图书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

[20]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8，(1)：38

[21]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 中国社会科学，2003，(2)。